

领导世界经济进入九十年代

亨利·R·诺 著

LEADING THE WORLD ECONOMY INTO THE 1990S

HENRY R. NAU

朱士清 高雨洁 校订

美国衰落的神话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中国经济出版社

89354

F171.25

1

美国衰落的神话 ——领导世界经济进入九十年代

亨利·R·诺 著

朱士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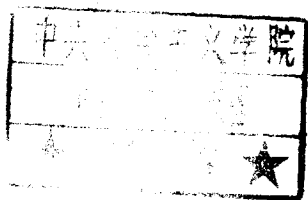
校订

高雨洁



200071714

DI7869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出版者说明

本书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提供版权和资助。全书由沈越组织翻译。赵春明译第一篇;袁连生译第二篇;赖德胜和冯文荣分别译第三篇的第5、6章;本书其他部分由何璋翻译。何桂莲负责全书校对。序言、导论和第一章由冯世则教授校订。

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瑞珍 张抒文

封面设计:刘学开 侯 明

美国衰落的神话

——领导世界经济进入九十年代

亨利·R·诺 著

朱士清 高雨洁 校订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兰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7.615印张 431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ISBN 7-5017-1109-7/F·720

定价:24.00元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Leading the World Economy into the 1990s

HENRY R. NAU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der the title: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Copyright © 1990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ton Street, Oxford OX2 6DP, United Kingdom.

For sale in Mainland China only and not for export therefrom.

All rights reserved.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领导抑或衰落：美国的选择	(10)

第一篇 国家的选择和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限制

第一章 目的、政策与思想：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取向模式	(29)
第二章 实力、市场、机构和社会： 选择取向概念与国际约束之间的关系	(74)

第二篇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三章 布雷顿森林协议：缺少足够的目的和政策.....	(109)
第四章 马歇尔计划：争取繁荣的目的和政策.....	(138)

第三篇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第五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非难：目的与政策的解体	(181)
第六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空泛的合作.....	(217)

第四篇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七章 1979—1982 年的衰退： 国内政策调整和国际冲突.....	(261)
第八章 1983—1985 年的反弹：失去的国际合作机会 ...	(303)
第九章 1985—1989 年的收缩： 没有国内调整的国际合作.....	(344)

第五篇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局限性

第十章 东西方贸易的管理：抵制、缓和与威慑·····	(395)
----------------------------	-------

结语 90 年代世界经济中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三位一体政策·····	(438)
-------------	-------

附录·····	(498)
---------	-------

文献索引·····	(510)
-----------	-------

序 言

本书探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它的观点与流行的自由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观点将二战后初期美国力量的支配地位与自由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随着美国支配力量的下降，自由的价值和市场将会衰退。但是当今世界的事态正好相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呈上升势头。1989年末，东欧突然转向自由和竞争的经济制度，震惊了世界，使美国和欧洲的知识界的许多人士处境尴尬，无力对这种剧变给以充分的解释，这些人前不久还在庆祝美国和西方影响的衰落。

本书为解释当代世界史无前例地趋同于更大的政治自由和对竞争性市场的依靠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框架。它提出，在日益发展的非强制性环境中（即不存在单一力量支配的环境），如果说各国更多地选择富有竞争性的路线组织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那么，这些选择必然反映着战后时代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和人们的取向，以及将市场取向经济政策与战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实践经验。同时，本书并不认为：这些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来自首要原则（即意识形态）或来自某些历史法则；以及西方价值和制度的明显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① 事实是，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的这些选择所反映的是一种运动中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人类和社会不停地辩论和决定，如何在本地区和本国范围内规定和

^①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国家利益》第16期（1989年夏刊），第3—19页。

组织政治、经济制度，并力图相互影响以便在国际范围决定这些同样的问题。战后时期，美国的选择在此过程中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它与自由价值和市场规则在世界上的传播始终密切相关。然而，难解的是，美国的基本政治和经济目标却在它力量已经衰落时，广为传布。但这并不保证将来。由于美国力量下降，它的选择在 90 年代变得更为关键。

本书是我 20 年来从事理论和实际工作的成果。它是思想和实践二者的结合；在思想领域，我以教师和学者为本行；在现实和实际的政策制订领域中，我曾于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初期在美国政府工作。本书试图说明思想如何改变现实，以及现实如何对思想的实施作出评判，并激发人们不断地寻求新的思维。

这种思想与现实或者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我说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富有成效。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深信，与现代化或制度建设相比，思想更逼近政治的核心——应当怎样做人，怎样参与人类社会。后者改变人类动机形成和行为的环境，但不改变那些长期持续出现的问题和人类必须作出的、关于如何相互对待的选择。25 年前，我是一名研究生。那时，现代化将导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趋同，并且实际上将导致人类事务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告终，这种宣告曾令我困惑。如今则另一种说法同样令我迷惑不解：自由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在关于基本的政治和人类价值观的斗争中已经赢得历史性的胜利，而且实际上它使人类事务的历史从此告终。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属极端。当代世界，西方思想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流行。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也是对 90 年代持世界乐观态度的主要理由。但是，西方意识形态远非未遇到挑战。穆斯林世界力争在世界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中国近来的事件表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恢复了活力。在俄罗斯、原苏联各少数民族共和国和某些东欧国家中，传统的独裁主义价值观念仍很强

大。与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积极的多元主义和开放的民主政治相比，日本推行着舆论较为一致的国内政治和内省的社会秩序。各国思想不同，而且仍将竞争。历史将继续要求人们作出选择。人们的信念和行为的准则仍将具有重大意义，包括意识形态以及认为历史已告结束的那些极端信仰。

任何研究者若要把思想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宣布前者、后者或两者都已到了尽头，那就必将遇见困难且为之付出代价。在本书中我实行了这种结合：一方面是早在我从政之前就已开始形成和发展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则有来自从政期间逐日进行的竞争性行政和政治决策过程的个人见解和责任感。学术界的同事们可能认为我的观点不甚具备他们的那种客观性，而过去的政府同事们则可能感到我的行为不够忠诚。难以避免的是，我将无法完全满足任何一方的要求。正如一位同事在给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只在一面旗帜下——我自己的旗帜下航行”。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走来时我确有失当之处，我只能感到遗憾。我不过是跟随思想和事实前进，无论它们引导我走向何方。

1975年我首次进入政府之前很久，我便在多种学术著作中质问过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和经济的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限制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赖以进行的传统资源；而由于存在核武器的威胁，即使此种竞争业已升级，至少也会使超级大国限制于外交和心理这样的非暴力形式。我反对70年代流行的一种结论，认为拥护自由社会、增长、低通货膨胀和个人首创精神的观念，将不得不在一系列新的情况上屈从：美国既失去了力量也失去了真诚、世界资源短缺、争端日见其多而社会则更难于管理、对公有资财的要求膨胀、于是更需要政府干预，等等。我顽强地相信，无论是出自什么原因，影响着这种结论的某些观念总是力图压缩人们作出政治和经济选择的范围。我相信，新的观念将有助于放宽70年代那种限制人的环境，为人们开拓更广阔的选择机会。

不奇怪的是，这些思想倾向与罗纳德·里根의思想和计划强烈呼应，里根向70年代的传统观念发起重大挑战。我于1980年4月第一次遇到罗纳德·里根，他强烈的信念以及就有抱负者而言的非凡的自知能力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开玩笑说，如若他竞选失败，那只是因为他在這個年齡并不真正需要总统席位。）我得到一个结论：我认为他的人格和原则足以为80年代制订一套新的思想观念，即令环境更为复杂，也能改变而不是一味适应它们。里根真诚相信观念的重要性；而政治自由和经济机会这双重观念在人类历史上受到的拥护比任何其他政治或经济观念都更为广泛。

我的思想倾向虽然和里根的思想一致，但我和他以往的政治生涯并无联系。我不属于党派的坚决支持者，至今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我两度从政，更多地出自机遇，并未长期有意争取。1975年，我申请并获得了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金；这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金计划多年来都是由奥尔顿·弗赖伊忘我的努力维持的。它使青年学者有机会从政而取得实际经验，同时鼓励年青的政策制订者离职一年，去学术界思考和写作。我曾作为特别助理在国务院工作两年，先是给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查理·罗宾逊当助手，后来供职于负责海洋、环境、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雷德里克·欧文的手下。1979年11月在夏威夷举行的核能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我得以认识里根总统的首席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正如俗语所说，一件事引起另一件，1980年4月，我作为对外政策咨询小组的成员参加了里根的竞选；随后在1980年12月，我接受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参谋的职位，负责国际经济事务和政府首脑会议。

这是令人振奋的经历，无论对个性还是智力的发展都是如此。自从1983年7月离开里根政府以来，我与这种实践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我并不掩饰我的观点仍受它的影响。某些读者可能会批评

本研究试图为我曾深深卷入的里根政府的早期政策辩护。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详细记载了1981—1983年间的最高级经济会议。我当时是筹备这些首脑会谈的三人小组的白宫成员。我希望这些同事们从整体上把握本书的论证和证据，不要由于我是所叙述的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而纠缠我的动机。

我之得到书中最重要论据，完全出于意外。当时我正竭力寻求评价80年代激烈的经济论战的实证性准则，准备将它们置于适当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观察，却十分诧异地发现，1947—1948年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奉为指导思想的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共识竟未反映新政和该时期“暗含的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以充分就业、调整、亦即国内工业的国有化为目标的广泛的政府干预。首次在本书中收集整理出来的数据见本书附录中以表格总结的40年来15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详细情况表明，战后初期的舆论，首先是在美国，然后也在较低程度上表现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一致表明政府所起的作用有限，主要是市场取向的作用。它奉行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争取最大、但不一定是充分的就业；它提倡以价格稳定为目标而让货币政策发挥稳定的作用；1947年后，它主张限制政府对某些工业或部门（微观经济）的进一步干预；长期坚持稳步减少贸易壁垒。1947—1967年间，主要工业国家的财政赤字微不足道；货币增长率和物价低而稳定；公共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完全没有增长；贸易壁垒虽仍存在，却也稳步下降。这些政策恰与战后时期最繁荣的经济成果相合；而60年代中期之后，较为强调国家干预，所导致的是较慢的增长。

为什么新现实主义在解释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时，始终忽视这一事实呢？我认为，观念不但影响历史进程，而且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人们并非一定要参加政府工作才会产生某些倾向或动机，因此才会采用此种而非别的调查方法或证据。

我还预期，我以前在政府的同事中也可能有些人不同意本书

的部分分析。我并不自以为属于鼓励着里根政府早期参与者的任何一个思想集团或经济流派。任何人若想在本书中寻找那种浅薄的反共人物、意志自由论者、自由市场理论家、供应经济学派、货币主义者或一味主张平衡预算或经常项目的教条主义者，都将一无所得。我认为上述种种观点没有哪一个掌握了在政治或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关键；评价这些因素，需要把它置于相应的环境之中，互相联系，并与见诸历史记录的实际经济成果联系起来考虑。正如本书的论述所表明的那样，以税收政策刺激经济而对财政预算和稳定货币有所考虑（即美国 6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晚期的经验），不能产生持久的经济成效；同样，仅仅减少预算赤字而无适当的税收刺激或灵活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即美国 70 年代早期的经验）也不可能成功。

本书虽以我自己的旗号为指针，但要承认，一路行来，我曾受到许多人的影响，甚为感激。学术界一些同事阅读了全部手稿且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其中好些人的政治信仰可能多少有些不同，或许，出于学术界的最佳精神即同行间的互相关怀，他们原就预期本书会令他们生气，使他们感到不愉快。彼得·卡岑施泰因、罗伯特·基欧汉以及海伦·米尔纳在这方面特别宽宏大量。以各种方式阅读并帮助我改进手稿的其他学术界朋友还有：伊曼纽尔·艾德勒、海沃德·阿尔克、戴维·鲍德温、本杰明·科恩、斯蒂芬·科恩、德斯特勒、罗伯特·邓恩、巴里·艾肯格林、阿米泰·埃齐奥尼、哈维·菲金鲍姆、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戈德法布、威廉·格特曼、斯蒂芬·哈格德、罗杰·汉森、奥利·哈夫赖利夏、杰弗里·赫尼格、兰迪·亨宁、约翰·伊肯伯里、布鲁斯·詹特利森、给翰·肯德里克、迈克尔·马斯坦杜诺、辛西娅·麦克林托克、理查德·罗斯、约翰·鲁吉、罗伯特·拉塞尔（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西蒙·塞法泰、加斯顿·塞格（也是政府中的一位同事）、戴维·斯皮罗、苏珊·托尔钦和罗伯

特·韦德。

曾与我在政府共事的同事们同样给我很大帮助。我特别要提出感谢的是马歇尔·卡斯，罗伯特·霍尔马茨、道格拉斯·麦克明、罗伯特·莫里斯、克莱德·普雷斯托威茨、迈尔·拉希斯、贝里尔·斯普林凯尔和艾伦·沃利斯，我曾与他们一起在里根政府工作，他们都对本书手稿给予了富有洞察力的评价。我特别要感谢理查德·艾伦和贾奇·威廉·克拉克，他们曾是里根总统的头两位国家安全顾问。尽管他们并未阅读或评论本书手稿，但是他们给了我参与政府最高层次制订政策的机会。他们与我虽无私交，却给我以信任。在高级机构中常见的含沙射影的攻击，令人遗憾；我认为他们这样的环境中还表现出不寻常的个人品格和正派作风。在非政府部门中评阅过手稿或对它有其他贡献的同事还有：克劳德·巴菲尔德、斯蒂芬·克兰、罗伯特·费尔德曼、埃伦·弗罗斯特、彭尼·哈特兰—桑伯格、罗杰·海登、皮埃尔·雅克特、迪特尔·马亨克、约翰·塔托姆、埃尔克·蒂尔、艾伦·托尼尔逊和约翰·约克尔逊。

这些学术界、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同事们中无人愿与我分担本书的责任，这是明智的。因此，我独自对它负责。但如本书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很大程度上倒是要归功于他们。

我感谢那些欣然给予我的研究以无法估价的协助的人们，他们是苏珊·桑顿、康斯坦丁·萨特索斯—西姆奥尼德斯、巴巴拉·巴拉吉、霍利·多宾斯和克劳斯·多伊奇。奥德丽·亚伯拉罕为我打字，效率极高，从不厌烦，洛伊斯·伯诺斯和保尔·麦克唐奈同样如此，特别是为本书准备各种图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赫伯特·艾迪生和他的助手安·菲什曼不倦地工作，付出无人得知的劳动，使本书更为有效而简洁地说明问题。他们的耐心和修养至今仍令我惊讶。赫布对本书出版的所有方面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牛津大学出版社对本书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罗恩

·哈里斯、史蒂夫·贝德尼、丹·伦迪和卡伦·凯西。

最为重要的是，我想感谢那些从专业上和财务方面使我得以从事这项研究的同行们。纽约的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给予我慷慨资助，1987年我之能向乔治·华盛顿大学告假，暂离本职，便部分地得力于此。我特别感激该基金会的伦道夫·理查森、德文·加夫尼、米查尔·格雷夫、皮特·巴特菲尔德和谢里尔·凯利。1987年，史密森氏学会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也给我提供了8个月的研究金。由于该中心的副主任塞缪尔·韦尔斯和国际安全研究计划主任利特韦克的关怀，在该中心作客座研究时效率特高而心情愉快。在1987年剩下的4个月里，约翰斯·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外交政策研究所为我提供办公室，它的执行主席西蒙·塞法泰教授对本书的学术方面极感兴趣，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同事：纽约的卡内基道德和国际关系学会主席罗伯特·迈尔斯和日美友好协会执行主席林德利·斯隆，当我们共同从事由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埃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以及道德和国际关系学会发起的以美日经济关系为内容的联合项目时，他们以各种方式给予我支持。同样，我感谢赫里蒂奇基金会主席小埃德温·福伊尔纳，他在关键时刻给予我宝贵的鼓励；并感谢纽约的莱尔曼研究所的拉里·莫内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汤姆·斯克拉多尼，两位都曾帮助本书的推销发行。

最后，我深深感谢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们，虽然他们当时希望我承担学校的行政职务，但在1987年却仍同意我请假。学院行政副院长罗德里克·弗伦奇和埃利奥特学院院长莫里斯·伊斯特允许我推迟一年就任埃利奥特学院副院长之职，随后又例外地允许我可以自由利用时间修订、编辑加工和推销本书。

对本书内容贡献最多的是我的妻子和女儿。我的妻子马里恩·凯·马德吉·诺，我称她米基。回顾往事，从60年代后期我还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起，她就是我所有学术著作的助产士。餐桌上、居室里或在某个别的地方，我们相对而坐，而我往往神游于这本书或那本书，她则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凝眸注视着我心不在焉的眼睛。这种情况之多，到了她和我都不愿重提的地步。我的女儿也常常奇怪，我为什么必得在地下室的书房里花费这么多时间，特别是一个又一个的周末。有一次我告诉她，至少要我这个岁数她才可能对此有所理解，她立即正确地批评了我这句话里的优越感。这时我便意识到，她的前途正在展开，那速度要比我的快得多，而她已经在努力创造未来。她和她的一代能够胜任这项任务而有余。我将此书献给她和她的未来。

亨利·R·诺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90年1月

导论 领导抑或衰落：美国的选择

近来常以头版头条宣称，美国的时代已经告终，而人类历史上国际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也随之一起结束。据说这一时代消逝的原因是美国力量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是美国当时的史无前例的优势的结果。这种优势使美国能够把它的自由经济观念输往其他西方国家，使西方市场一体化，抵制世界共产主义和捍卫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然而美国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经济竞争的对手赶了上来（肯尼迪，1987年）。特别是日本，它带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复兴，它日益使战后时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黯然失色，并以新的干预主义经济观念向美国时代的自由主义政策提出挑战。经济竞争削弱了西方军事同盟。随着东欧和苏联的国内改革进程，共产主义威胁减退了。美国承担领导全球的各种重负的意愿和能力都已不如往昔，欧洲和日本则对发挥全球性作用犹豫不前。西方世界面临着目的和力量都较前分散所带来的冲突。

人们还告诉我们，美国的政治加速了美国力量的衰落。随着权势阶层的逐渐兴起，政治利益集团大量出现，它们一味寻求财富再分配，而不关心增长（奥尔森，1982年）。在这些集团的影响下，国内消费超过了投资和生产；对外领导的负担，特别是军事负担加大；技术创新的利益扩散到其他国家（吉尔平，1981年、1987年）。在80年代，美国的政治全面受阻而仍然热中于过度消费，为此大举外债，在1986年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在进入90年代之际，美国看来再次成为一般国家，而战后那段时期则不过是大国兴衰、经济荣枯这种永恒循环中的又一个插曲。

但是，这一切都是真的吗？美国时代是否已告结束，抑或只是由西方时代所代替？在这个西方时代，非共产主义国家和改革中的共产主义国家日益分享美国的目标，竭力效法西方的多元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此外，当代美国在工业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此计算已按汇率波动作出调整）与 70 年代相同；80 年代美国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增长率和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体现着战后复兴初期的那一派兴旺繁荣；当此之际，是否能说美国力量明显衰落？无论目前的政策能否维持或进一步提高美国的力量，与其断言美国的力量和政治已经式微，无可挽救，不如就这些政策进行辩论，从而认识到由于美国的某些基本目的已在世界上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美国有可能不再需要过去那样大的力量？

本书所要论证的是，若以美国的统治地位和利益集团政治，则远不如以美国对国家目的和经济政策的选择能更有说服力地去解释美国战后时期影响的兴衰。当 40 年代美国的战略和经济政策鼓舞西欧和远东自由社会的复兴和重建时，当美国的选择向极权社会提出挑战并加速了 80 年代的技术革新时，美国的影响得以扩大，而且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对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的急剧转折作出了贡献。而在其他时期例如 70 年代，当美国对自身的价值感到怀疑而选择了缺乏效率的经济政策时，它的影响便告减退了。

因此，与力量转移必不可免并将导致冲突的历史结论相比，对美国在未来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就美国的选择进行辩论。美国的选择可以是承认并且尽力加强当代世界向着政治制度更自由、经济制度更有竞争性这种卓越目标趋同；或者是断言美国和新的强国，例如日本，也许还有重新统一的德国，利益根本不同，因此冲突必然无可避免。